

试论明清时期陕西茶品牌的嬗变

姚健, 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杨凌 712100)

摘要 明清两朝陕西茶大致经历从汉中茶、泾阳茶到紫阳茶的阶段, 每一阶段茶对于当时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其制茶技艺各有特点。明清时期陕西茶品牌嬗变是由茶马贸易制度的演变、人口迁徙融合、内在文化濡化等因素造成的, 陕西茶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有利于促使制茶技艺简化, 有利于陕西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

关键词 汉中茶; 泾阳茶; 紫阳茶; 茶马贸易

中图分类号 S-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12-0248-05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1.12.06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On the Evolution of Shaanxi T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O Jian, FAN Zhi-mi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Shaanxi t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oughly went through stages from Hanzhong tea, Jingyang tea to Ziyang tea. Each stage of te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at time, and its tea-making techniques ha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brand evolution of Shaanxi t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caused by the evolution of the tea-horse trade system,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internal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haanxi tea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facilitating the simplification of tea making techniqu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aanxi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Key words Hanzhong tea; Jingyang tea; Ziyang tea; Tea-horse trade

茶叶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 由于社会经济及茶文化的发展, 陕西南部成为我国最北界、最重要的茶区之一。陕南独具的纬度、海拔与湿热的气候条件是优质茶叶生产的先天优势, 因此陕南茶叶早在唐代便受到人们重视, 陆羽在《茶经》中记载, 山南“金州、梁州又下”^[1], 唐代陆羽将汉水中上游划为山南茶区。山南茶区茶叶品质优良, 是上贡朝廷的主要贡品之一。《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土贡穀、蜡、红蓝燕脂、夏蒜、冬筍、糟瓜、柑、枇杷、茶”, 金州(今陕西安康市)“土贡麸金、茶牙、椒、干漆、白胶香、枳壳、雷丸、枳实、黄蘗, 有橘官”^[2]。宋代疆域缩小, 为了战事需要而进行的茶马贸易促进了陕南茶业的繁荣。陕南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 宋代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里提到, 洋州和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3]。洋州“西乡县产茶, 亘陵谷八百余里”^[4]。金州也产茶, “永兴等路, 惟是金州所出, 乃影带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杂伪末茶, 其价高贵, 陕西之民良以为苦”^[5]。元代陕南茶业有所跌落, 《元史·食货志》关于汉中税收的记载, 也仅仅提到生姜税, 可见蒙古贵族对陕南茶业重视程度不高, 以至于未有税收。明代陕南茶业逐渐恢复, 再次成为朝廷依赖的茶叶产地, 《明史·食货志》记载, 朝廷下令“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 十取其一, 以易番马, 从之。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 定税额, 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6]另外明太祖朱元璋对户部尚书郁新用说: “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 可得马三万匹, 四川松茂茶如之。”^[6]朱元璋甚至因为禁私茶而杀掉驸马都尉欧阳伦, 可见陕西茶业在明代因为茶马贸易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史稿·食货志》记载: “康熙四年, 遂裁陕西苑马各监, 开茶马市场于北胜州; 七年裁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7]。管理陕西茶叶的茶马司逐渐被裁

减, 清代陕南茶区日趋没落。

学术界对于明清陕西茶叶的著述颇丰, 多数学者从茶马贸易的角度分析^[9-11], 部分学者从茶禁等制度层面来探讨陕西茶业^[10, 12-13], 也有学者考虑到陕西茶业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对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14-16], 但几乎没有学者关注到陕西茶品牌的变化。笔者从陕西茶品牌嬗变的角度出发, 探讨陕西茶品牌嬗变的过程、原因及影响, 以期对当今陕西茶品牌的发展有所裨益。

1 从汉中茶到紫阳茶的发展

1.1 承唐继宋的汉中茶 汉中茶即陕西南部汉中茶区所产之茶, 或称为汉茶, 汉中茶区以西乡、洋县为主, 西乡县每年征茶税至 20 680 斤(10 340 kg)^[17], 汉中茶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汉中茶区凭借明代茶马贸易走向兴盛, 然茶马贸易起源较早, 最早记载见于唐代, 明代熟悉茶马贸易情况的官员杨一清也认为是“自唐世回纥入贡, 已以马易茶”^[18]。安史之乱中回纥曾两度出兵帮助唐王朝平乱, 唐为答谢回纥赠送绢两万匹, 回纥则送唐两万匹骏马换茶和丝。吐蕃也在唐的影响下习得饮茶之风, 开元年间唐与吐蕃曾在赤岭(即今日日月山, 在青海省湟源县西)、陇州(辖今陕西千水流域和甘肃华亭县地, 治所在今陕西陇县)等处互市, 主要交换物品为马和茶叶。宋代为抵御北部金、辽、西夏等政权的侵犯, 茶马贸易一度十分兴盛。明代初期北元势力长期骚扰北部边疆, 为缓解马匹供应问题, 明朝廷在西北和西南同少数民族延续了唐宋的茶马贸易政策。陕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意义, 可与西北西南依靠位置优势开展互市, 其境内的陕南茶便颇受重视。陕南汉茶之所以能够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 不外乎因汉中府毗邻西北茶马贸易地而已, 贸易的兴衰将直接关系到茶生产情况^[19]。

汉中茶的兴盛还与人口增加有关。弘治末至正德初年的陕西总督马政都御史杨一清曾认为汉中府“国初人民户口

作者简介 姚健(1995—), 男, 陕西镇安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农业历史。* 通信作者, 教授, 从事农业历史研究。

收稿日期 2021-02-15; **修回日期** 2021-03-16

不多,茶园亦少”,后“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数多,已经节次编入版籍。州县分里,俱各增添,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另外陕西按察司僉事唐希介也说:“汉中府金州、西乡、汉阴三县,俱系产茶地方。如汉阴一县,原设在廊、新安二里,后因招抚流民,增添九里。近因大造黄册,又添一里。今以十里之民,止纳二里之课。况自招抚以来,其延安、庆阳、西安等府人民,流移到彼,不可胜纪。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其沿江一带多不起茶课”^[20]。以上材料表明人口增加促进了茶叶种植面积扩大,而茶课却未增加,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汉茶发展的。但同样应看到:“止纳二里之课”,除了茶课外剩余茶叶应尽为商人所购买,或是成为凭借茶引按规定的商茶,或是违法售卖的私茶。

唐代占主导地位的制茶技艺为“蒸青”,基本以团茶为主,其制作分为采、蒸、捣、拍、焙、穿、封7个步骤,将蒸制捣烂后的茶制成团饼,经炭火焙干之后用竹子或绳子穿起来封存。唐代饮茶方式主要是煎茶法,团茶被碾成茶末后按照一定的步骤煮制成茶汤。宋代饮茶之风相较于唐代更胜,团茶制作技艺得到空前的提升,其代表“龙凤团茶”达到了中国制茶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其制作过于繁琐,耗费大量物力人力,仅供上层人使用,不利于茶推广和发展。明代后制茶技艺有较大变化,改为“炒青”,取代唐宋工艺繁杂的团茶,不仅便于制作,而且较大程度地保留了茶叶的本味。

1.2 力挽狂澜的泾阳茶 泾阳茶以茶加工于泾阳、三原地区而得名,称“泾阳砖”,因在伏天加工,故又称“茯茶”“茯砖茶”。泾阳县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泾河下游,拥有肥沃的土壤与便利的灌溉资源,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明代茯砖茶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为原料,经过发酵与发花制成茶砖,运往西北地区与少数民族开展贸易。茯砖茶依托泾河水、关中独特的气候与技术,深受高寒地区游牧民族的喜爱,明代后期成为茶马贸易的茶叶主要来源。茯砖茶具有独特的品质与口感,能够御寒提神、解油去腻,对人体有一定的疾病预防和健康调节作用,为其他茶叶所不及。另外,由于“汉川茶少而值高,湖茶多而值下”,并且“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21],其制作的茯砖茶价格比汉中茶低,适合西北少数民族的需要。

明代中后期汉中茶开始衰落,其重要的转折事件是万历年间汉茶与湖茶之争。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巡察御史李楠在《议禁湖茶疏》中写道:“自湖茶行后,各自利于夹带,短贩得以盛行,甚至汉中、保宁仅止一二十引,茶户欲办本课,往往私贩出边,番族利私茶之贱,因而不肯纳马。此湖茶之有碍于汉、川也”^[22]。李楠所奏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行湖茶后严重导致私茶盛行,影响了正常的茶马贸易。但御史徐侨反对禁湖南茶,理由是:“汉、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23]。“湖汉之争”矛盾尖锐,但不可否认的是:湖茶参与茶马贸易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全面禁止已然无法实现。后户部采取折中的措施,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表面看是维护了汉茶的正统地位,实则给予了湖茶参与茶马贸易的合法地位。自此至明末

这一政策无改动,湖茶凭借汉茶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明中后期独领风骚,汉茶再未崛起过。

明代政府为鼓励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而施行给予食盐运销权的制度,即“开中”制度。关中商人为充分利用土地优势而勤勉开垦,出现了“疾耕积粟,以应开中”的现象,泾三地区依靠贩盐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因人口增殖明代该地区面临严峻的人口资源压力,泾阳县“泾之饶,原不出于土,故民亦不甚爱土”^[24],三原县“中人之家不能逾十亩”^[25]。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逐渐尖锐,日渐增多的人口“精耕细作”却所得粮食日少,相反,部分大地主依托开中获得财富,农商对比显而易见,为维持生计缺乏土地的人们不得不外出寻找机会。泾三地区的人们被迫走上从商之路。明成化、弘治以后茶禁日弛,茶商取得了合法的运茶权和开中抽分权,川茶及汉中茶因为该征折色而湖茶茶引合法化,茶商成为支配茶叶流通的实际支配者。陕西商人从湖南购回茶叶在泾三地区加工成茯砖茶,利用其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沟通中原与西北边疆的地理优势,积极开展贸易,陕西商人以其财力雄厚被称为“西秦大贾”。

1.3 兼收并蓄的紫阳茶 清代以前有“汉中之茶独产西乡”^[26]之说,随着明代的衰亡,清统治者将蒙古西藏等产马地区纳入版图,每年可获取大量进贡的马匹,不再需要以换取马匹的粗制的砖茶,汉中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紫阳茶的兴起,紫阳县成为陕南最大的产茶县。紫阳得名于道教南派创始人张伯端(号紫阳真人),境内无冬寒,气候垂直变化较大,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紫阳县是全国迄今已发现的两大富硒区之一,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动植物天然含硒。

清代紫阳茶生产的情况,前人有许多记述,“清代陕南惟紫阳茶有名,而本县之茶则绝迹市场”^[27]。西乡作为汉茶的主要产地,其重要性已不存在,卢坤记载紫阳县产茶情况:“山内产茶,即在包谷地内,地坎地边,到处皆有”^[28]。光绪三年(1877年),紫阳知县告诫下属:“为贡茶事,案奉各宪檄飭查照上届贡茶数目,严催采办,务于二月内申解等因,奉此合行催办,……照依后开各数目传喻各茶户,遵照上例,作速采办细嫩上好茶叶,务于二月内照数送,当堂领价,以凭申解。……毋违,速速,须案”^[29]。紫阳茶因为茶叶质量高,茶叶饱满,香味醇厚,成为上贡佳品。作为贡茶,紫阳茶的原材料、制作技艺必然是极高的,据记载“茶之原质色香,味较他处所产俱胜,谷雨前毛尖,尤称上品”^[27]。贡茶由茶户采摘谷雨前最好的嫩叶进行烘焙,为皇宫所用,茶叶要求技艺高,加工过程繁琐,百姓负担较重。综上所述,清代以紫阳县为主产区的紫阳茶兴起,陕南茶业再次复兴。

2 茶品牌嬗变的成因

陕西茶在明清几百年时间里发生的变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不可忽视茶马贸易制度、人口迁徙融合、内在文化濡化对陕西茶业的影响,但又必须看到陕西茶不同发展时期有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每个因素在其发展阶段发挥作用不同,需要有针对性地讨论。

2.1 茶马贸易制度的演变 陕南是明代茶马贸易的主要茶源地,茶马贸易制度的兴衰对其茶叶的生产有较大影响。明代茶马贸易肇始于洪武五年(1372年),“诏有司定税额,设茶马司于秦挑河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凡五千余里,于是西番诸部落之市马者悉至”^[30]。郭孟良将明代茶马贸易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从洪武初至正统十四年金牌信符制度废除为止,是茶马贸易迅速兴起和繁荣时期,其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官方强制性;第二个时期自景泰初至弘治年间,是茶马贸易中衰和式微期;第三个时期自弘治末至正德初,是短暂的调整改革期;第四个时期自正德中至明末,是再度衰落期,官市贸易虽几经调整,仍无法改变其江河日下的趋势”^[31]。在茶马贸易兴起和繁荣时期,政府采取强有力的举措促进贸易的进行,主要采取金牌信符制度,这是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制度。在中衰和式微期,陕西茶作用更加凸显。四川茶“番马悉由陕西道,川茶多泡烂”,不得不改收折色,景泰二年全停卫所兵丁运茶,茶马贸易的重心转移到西北三大茶马司,茶叶主要依靠陕西茶和收缴的私茶。虽然这一时期易马数量减少,“以此易马多不过数百匹,至千匹而止”,然而确是汉中茶最受依赖的时期。弘治末至正德初进行短暂的调整,收效甚微。正德中至明末是茶马贸易的再度衰落期,商人资本大量参与到贸易中,政府的主导性减弱。

茶法茶禁日益松弛也影响茶马贸易制度的变化,陕西茶地位变化取决于其对于茶马贸易的作用,明代为取边曾倚仗陕茶,然清代疆域空前扩展,解决了明代长期备受困扰的民族问题。中原王朝强化了中央集权,对马匹需求量下降,因而陕西茶叶地位不断下降。

2.2 人口迁徙融合的推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与人口增长,中部平原及地势相对低缓的丘陵山地几遭开发殆尽,山区则成为更多迫于生计压力与逃避战争而不得不迁移的人口的选择。陕南作为陕西地区茶叶主产地,长期以来人口稀少是有原因的,除去不变的自然环境与交通外,战乱严重制约着当地茶叶的发展。宋金对峙时期,南宋在汉中进行顽强的斗争,人口损失严重。元朝蒙古人并不重视该地的发展,明朝建立很长时间内陕南人口仍然严重不足,明宣宗时汉中官员曾乞求政府组织移民,但遭拒绝。《宣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初,陕西汉中府奏:本府所属一十三州县,止有四十七里,民少役繁,金州、南郑诸县多闲田,乞徙山西、陕西、四川附近州县丁多之家,以实其地。上谓行在户部曰:人情安土,迁之殆难,其与六部议,至是议奏天下郡县人民版籍已定,产业有恒,若遽迁之,地乡不无惊扰,不可迁。从之”^[32]。政府以“番汉顽民多潜遁山谷间,不供征赋,不守法度”拒绝向陕南移民。梁方仲先生制成明代初期的各地区里数图表,其中汉中共计五十三里,商州三十里^[33]。按照明代“一里一百一十户、一户五口人”计算,共计约有45 650人,人口密度过于稀疏,于是导致“无主茶园”大量存在。后经“减其租赋、宽其徭役”,奖励藏匿深山老林的农民回平原耕种,汉中府人口才愈来愈多,田培栋先生《陕西社会经济史》书中具体的人

口数据统计显示^[37],到嘉靖时陕南人口达至明代顶峰。

万历后陕南地区多次发生自然灾害与战乱,人口流失严重,陕南茶业走向没落。从明末到清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平定,陕南山区动荡达50年之久。明代末期李自成、张献忠曾在陕南与政府军队反复较量,同时陕南也是地方武装争斗的场所,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吴三桂占据汉中东长达5年。各种武装力量往来陕南,导致当地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明末名臣卢象昇对秦巴山区东部的残破景象有如下描述:“兵燹频仍,一望荒郊,于遗殍尽。臣每介马而驰于穷崖绝谷中,百里不见炊烟,不逢人迹。即有一二鹄面鸠形之辈,寄息山岩石窟之间,所食皆草根树皮,遥望官兵,辄骇而他……山民本非土著,生理鲜少,落落晨星,一当寇警,死者十三,逃者十七,就中投入贼伙者亦多,迄今地亩抛荒,庐舍燬尽,几于千里不毛”^[34]。战祸使得原本数量不多的陕南人口大量减少,有清一代政府采取措施吸引流民入陕南开发。“湖广填四川”使得湖广行省的人口延伸至陕南,由于迁入陕南的移民亦以湖广为主,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延续”^[35]。康熙晚期开始,各地流民涌入秦巴山区,到道光朝为止。移民涌入为陕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

陆羽认为茶“上者生烂石”,即生长在岩石风化后的土壤上的茶叶为上等茶,白河、紫阳、石泉等地都是荒山僻壤,移民加速向“烂石”区域开发,这些地方极适合上等茶叶的生产。移民涌入,促进了制茶技术的提升。清乾隆以后,湖广川湘一带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入,他们占据山林,垦荒种粮,同时恢复了茶叶生产。紫阳县南与四川万源紧邻,东部离湖北较近,“巴茶”与“湖茶”又具有悠久的制茶历史,随着人口流动,原有的制茶技艺也被带到紫阳一带。清康熙《紫阳县新志·物产》载“地皆瘠瘠,他无所产,唯紫茶充赋”^[36],紫阳县土地贫瘠,移民只能效仿土著开垦更偏远的林地,继而从事茶叶生产。同时,拥有制茶技艺的移民融合土著的技艺,制作口味优于前时砖茶的紫阳青茶。以种植紫阳青茶为主的紫阳茶区在清朝中期最高年产量为1 500 t,其中紫阳县1 000 t以上^[37]。

2.3 内在文化濡化的拉力 明清时期文化也是促使陕西茶变化的重要拉力之一,宫廷文化、宗教文化、诗歌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和推广了陕南茶。宫廷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宫廷范围内的文化,广义上来说,宫廷文化是指封建社会时期以宫廷为核心的上流文化。龚斌认为,“作为主宰整个社会的宫廷,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的绝对尊严,不允许民间‘僭越’皇族的一切;另一方面却又强制推行他们制造出来的帝王至尊、皇权神授等许多思想观念,迫使人们接受宫廷的某些文化”^[38]。几千年来,以封建专制皇权独尊思想为核心的宫廷文化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走向,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尽管叶茶、散茶早在唐代陆羽《茶经》中已出现,然而一直并未被上流社会所喜爱,明太祖出身下层,对叶茶情有独钟,他即位之后即废龙凤团茶,改叶茶、散茶为进贡之茶。虽然茶马贸易陕茶仍为团茶,可在内地茶域内已悄然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茶叶革命”,上流文化尽皆模仿,以至于

明代专制泡茶的茶壶成为主要的茶具。宫廷享用的茶即贡茶,对地区茶叶生产具有指导意义,茶区的茶叶生产几乎可以说都是围绕贡茶展开的。开展宗教活动离不开茶,随着宗教活动的兴盛,茶的地位日益突出。汉族以外的民族接受茶相对较迟,“食肉饮酪的民族中,吐蕃是最先接受茶的,其后是辽金治下的民族,蒙古族应该是从全面统治中国开始后才接触到茶”^[39]。茶在藏传佛教的地位,唐代起就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寺院兴茶已是共识。有明一代蒙古虽与中原王朝联系较少,却积极致力于与西藏的联系,俺答汗和索南嘉措1578年在青海湖东面的仰光寺会面,这次大会后就有蒙古各部落的贵族子弟108人出家。藏传佛教在蒙古得到了较好的传播,佛事需要大量用茶,也间接改变了蒙古人不喜饮茶的习惯,蒙古族还创造了“炒茶”,茶得以逐渐融入少数民族的生活。提及宗教,不得不重视陕西境内的道教。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历史悠久,汉代备受推崇,陕南许多道教名山,有“八大道教名山”之说,如终南山、太白山、紫柏山、塔云山等。道家讲“清静无为”,探求长生不老的炼丹之术,有“辟谷”之术,日常同样看重饮茶。陕南茶叶种植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样,茶品种口味的改变也与道家的需求分不开。修道者追求简朴的生活,饮茶亦渐趋清淡。用于茶马贸易的团茶紧压茶和泾阳茶砖滋味醇厚,而叶茶相对清新,符合道家的需求。唐代以后有大量描写陕南茶叶的诗歌。唐朝诗人薛能《西县途中二十韵》:“汗凉风似雪,浆度蜜如沙。野色生肥芋,乡仪捣散茶”^[40]。岑参在《郡斋平望江山》诗:“水路东连楚,人烟南接巴。山光围一郡,江月照万家。庭树纯栽桔,园畦半种茶”^[40]。姚合在《金州任职刺史时,他在《别友人山居》写道:“独向山中觅紫芝,山人勾引住多时。摘花浸酒春愁境,烧竹煎茶夜卧迟”^[40]。晚唐李洞《送庐郎中赴金州》诗:“危栈窥猿顶,公庭扫鹤毛。出军青壁罅,话到白眉毫”^[41]。通过这些诗句,唐代陕南茶之滋味可见一斑。宋代文人中吟咏陕南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吕陶的《以茶寄宋君仪有诗见答和之》诗:“九峰之民多种茶,山村栉比千万家。朝脯伏腊皆仰比,累岁凭恃为生涯。一朝使者忽禁榷,振举法令摇三巴”^[42]。到了明清时期,陕南山区开发力度加大,陕南茶与文人联系更加密切。明朝王九思《金州州守惠茶赋谢》诗:“老去难胜酒,闲来独倚楼。使君题玉版,仙茗自金州”^[43]。清初安康文人刘应秋的《新茶》:“雀舌经春长,阴岩初吐芽。淡黄肥夜雨,轻白映朝霞”^[44]。嘉庆年间著名文人叶世倬《春日兴安州中杂咏》:“桃花未尽开菜花,夹岸黄金照落霞。自昔关南春来早,清明已煮紫阳茶”^[45]。陕南茶常散见于历代文人的诗作中,不乏关于生产加工、烹煮饮用的描写,其对陕南茶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

3 陕西茶历史意义

3.1 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明清时期陕西茶在经济贸易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茶是沟通内地与边疆地区的媒介,通过茶叶贸易,边疆少数民族获取到了生活缺乏的茶叶、布匹等,中原汉族得到了马匹和皮毛等。明代以茶马互市为主要经济交流,加强了中央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交流,尤

其是明中期以后,贸易进一步扩大。有清一代将蒙古纳入版图,虽然因战争需求马匹而产生的茶马贸易已发生改变,但经济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仍超前代。中原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茶在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3.2 促使制茶技艺简化 陕西茶曾长期用于茶马贸易,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饮茶方式略有不同,对茶制作技艺亦起到交流发展的作用。茶发展历史悠久,同样饮茶茶具亦有不同发展,大致有唐碗、宋盏、明壶、清盖碗等,每一种茶具在当时占据主要地位。唐宋饮茶以烹煮为主,宋代社会经济发展,代表茶为龙凤团茶,有人曾评论龙凤团茶有独特的制作工艺,《东溪试茶录》记载要求如下:“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为茶病”^[46]。由此可看出龙凤团茶制作工艺要求较高,制茶过于崇尚繁琐。及明太祖罢团茶以后,散茶用于茶马贸易,明代沈德符撰《野获编补遗》载:“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47]。自朝廷推崇叶茶之后,有利于改善繁杂的制茶技艺,有利于制茶技艺的提升。

3.3 提升陕西地区经济水平 明代中前期易马主要依靠川陕地区的茶叶,沉重的赋税和劳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续文献通考》说:“明代茶课惟川陕为最重”^[48]。洪武初年规定“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而川陕地区“每十株官取一”,其赋税比他地多两倍。同样,运输也增加了川陕边境卫所军士的经济负担,“每岁茶易马匹领军未至,比寄派各卫军余饷养。夫边境之军,地方苦寒,生艺寡薄,平常之日,衣食固有所不贍,而复以养马责之,一有瘦损倒死,重则追赔本色,轻则追纳内脏银两,家业不逮,鬻及男女,彼何辜哉!此寄养茶马之未平也”^[49]。繁重的赋税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陕南地区原本生于脆弱环境中的人们生活更加艰苦。明中后期湖南黑茶成为茶马贸易主要依靠的茶叶以后,朝廷对于陕南地区依赖度降低,百姓得以较多从事农业生产。关中地区以泾阳三原为中心发展的砖茶加工与贸易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泾三地区出现一批跨省的大茶叶商人,如泾阳的刘一兴“以经营茶业、药材为主,商号多设四川、西康等地”。社树姚家,“分为恒昌、惠谦、燕义、居敬、祝新、仁在七支,不但在泾阳、三原、西安开设货栈、钱号,而且发展到巴蜀康藏云贵地区,以雅安为中心”,这些成为明清泾阳经济繁荣的缩影。清代移民涌入,促进了当地山林的开发、茶区面积扩大。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载:“陕省兴、汉二属暨终南山一带地方险要,请改设官属,以资控制,以重稽防事。窃照陕西兴安直隶州,滨临汉水,背负终南,为秦楚之关键,亦荆襄之门户。万山重叠,永惜四塞奥区,形式最为险要,该州管辖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以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则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该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50]。大量流民

进入更加偏僻荒芜的深山对茶区面积扩大有重要意义,茶叶远销关陇,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4 结语

陕西茶曾在历史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带动经济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汉中茶、泾阳茶,还是紫阳茶,茶叶的兴盛衰亡与历史条件紧密联系。汉中茶凭借紧邻西北的优越地理优势受到重视,而汉中茶区在明代中后期因为人口流失严重和较为落后的茶叶制作技艺而逐渐衰落;关中地区不种植茶叶,来自湖南的黑茶进行二次加工即被赋予独特的陕西文化色彩;清代康熙以后虽然多有外来移民,但汉中茶未能复兴,取而代之的是加工技艺要求更高的紫阳茶。3种茶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口感,汉中茶为获取马匹行销少数民族地区,故而是粗制的团茶紧压茶;泾阳砖茶经过发酵,其滋味更宜酥酪;紫阳青茶滋味醇厚,香气浓郁,除作为贡品外,销往关中、陇南等地,茶叶质量高。3种茶各具优势特点,陕西茶的嬗变是一个动态的替代的过程,研究有利于厘清陕西地区茶文化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对于当下陕西茶的生产销售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陆羽.茶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苏辙.乐城集:中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4] 脱脱.宋史:卷三八八[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 张廷玉.明史:卷八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7] 赵尔巽等.清史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8] 赵国栋.宋爱明.陕西茶史与藏茶文化[J].中国茶叶,2014,36(4):39-40.
- [9] 梁中效.陕南茶文化与绿茶产业开发研究[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3):1-9.
- [10] 王冰.明朝初期汉藏茶马互市的几个问题[J].西北史地,1998(3):82-84.
- [11] 罗卫东.秦蜀茶马古道考述[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32(3):1-11.
- [12] 冯海燕.朱元璋治藏茶禁政策考述[J].西藏研究,2018(4):34-39.
- [13] 陈茜.明代西北私茶贸易论述[J].农业考古,2016(2):150-155.
- [14] 白振声.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2,9(3):28-34.

(上接第247页)

的冬小麦结果具有高制图精度和用户精度,可保证其识别结果比中高分辨率更准确和可靠。

虽然通过遥感识别冬小麦分布比人工识别存在一定的模型误差,即训练数据、遥感影像获取时间、遥感影像获取质量、分类器的不同,以及影像中混合像元和阴影的存在会对冬小麦识别结果造成一定影响。而该研究构建了均匀足量的训练数据,选取近年来表现出色的强分类器 RF 和 SVM,尽可能降低了模型误差。冬小麦分类结果目视分析显示,研究区冬小麦种植区域除林地-冬小麦混种类型外,其他均被准确识别。相对于人工识别忽略地块之间的乡村道路,地块内部的土包、田垄等地物类型均被遥感准确识别,从该角度分析,基于 GF-7 遥感识别的冬小麦分布结果在精细化程度上可能比人工识别结果更准确。

参考文献

- [1] 钱文荣,郑黎文.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现

- [15] 王晓燕.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10,21(1):111-115.
- [16] 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6,21(2):34-40.
- [17] 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 [18] 丘浚.丘浚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 [19] 刘森.明代茶业经济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 [20] 陈良学.明清大移民与川陕开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 [21] 张廷玉.明史:卷八零[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2] 顾祖成.明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 [23] 徐海荣.中国茶事大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24] 钟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M].合肥:黄山书社,2004.
- [25] 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三原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 [26] 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编——方志茶叶资料汇编[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 [27] 吴觉农.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 [28] 卢坤.秦疆治略[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
- [29] 田晓光.档案佐证陕南紫阳茶的贡茶身份[J].中国档案,2008(6):68-69.
- [30] 张廷玉.明史:卷八零 食货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1] 郭孟良.略论明代茶马贸易的历史演变[J].齐鲁学刊,1989(6):76-82.
- [32] 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 [33] 方觉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记[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30.
- [34] 卢象升.卢象升疏牍:卷一 停征修城积谷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35] 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36] 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紫阳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 [37] 樊光春,程良斌.紫阳茶业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 [38] 田静.秦宫廷文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 [39] 周重林.从俺答汗求茶看茶在明朝的政治地位[J].青海民族研究,2012,23(2):126-131.
- [40] 周振甫.唐宋词元曲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9.
- [41] 杨克,李厚之,张会鉴.安康历代诗词点校[M].安康:安康东风印刷厂,1998.
- [42] 徐海荣.中国茶事大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43] 李厚之,张会鉴,郑继猛.安康历代名人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 [44] 郑继猛,胡景乾,李厚之.一视斋集校注[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45] 谈俊琪.安康文化概览[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46] 巩志.中国贡茶[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
- [47] 秦泉.中国茶经大典[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
- [48] 王圻.续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49] 丁守和.中国历代奏议大典[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
- [50] 严如煜.严如煜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3.

状与展望[J].中国农村观察,2011(1):31-38.

- [2] 高园园,孙畅,袁如金.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在第三次农业普查中的应用研究[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9,42(1):102-105.
- [3] 王利民,刘佳,杨福刚,等.基于 GF-1 卫星遥感的冬小麦面积早期识别[J].农业工程学报,2015,31(11):194-201.
- [4] 郭文茜,任建强,刘杏认,等.统计数据总量约束下全局优化阈值的冬小麦分布制图[J].遥感学报,2018,22(6):1023-1041.
- [5] 覃泽林,谢国雪,李宇翔,等.多时相高分一号影像在丘陵地区大宗农作物提取中的应用[J].南方农业学报,2017,48(1):181-188.
- [6] 王东,方圣辉,王政.基于光谱特征和颜色特征的油菜提取研究[J].农业机械学报,2018,49(3):158-165.
- [7] 刘剑锋,贾玉秋,张喜旺.基于时间序列 MODIS-NDVI 的冬小麦遥感识别[J].湖北农业科学,2017,56(8):1560-1563.
- [8] 李霖,余梦媛,罗恒.ZY-3 卫星全色与多光谱影像融合方法比较[J].农业工程学报,2014,30(16):157-165.
- [9] HARALICK R M. Statistical and 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texture[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1979, 67(5): 786-804.
- [10] BREIMAN L. Random forests[J]. Machine learning, 2001, 45(1): 5-32.
- [11] 王芳,杨武年,邓晓宇,等.高分二号数据的城市生态用地分类方法探讨[J].测绘科学,2018,43(3):71-76.
- [12] CHANG C C, LIN C J. LIBSVM: A library for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rticle)[J].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2011, 2(3): 1-27.